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崛起及其覆灭

谭 宗 级

关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出现和覆灭的过程，我们党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所作的斗争，中央专案组编印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三批材料，已作了全面的揭露和批判；关于林彪历史上的错误和问题，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已有系统的揭发；关于林彪反革命集团篡党篡国、祸国殃民的重大罪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列举了四大罪状，同志们都看到了；关于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极“左”路线的主要特征，以及我们同林彪、“四人帮”作斗争的经验教训，叶剑英同志在国庆三十周年的讲话中作了全面的概括和深刻的阐述。可以说有关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各种问题，同志们都很熟悉，我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好讲的。思虑再三，只好就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崛起及其覆灭这个问题介绍一点情况和材料，供同志们研究时参考。下面讲五个问题：

- 一、林彪成为“接班人”的原由；
- 二、林彪反革命集团和“四人帮”的关系；
- 三、林彪反革命集团形成的几个主要问题；
- 四、林彪反革命集团走向破产和覆灭；
- 五、严格区分敌我界限和路线是非。

（一）林彪成为“接班人”的原由

过去，林彪死党吹嘘林彪“一贯紧跟”、“一贯正确”、“一贯高举”，那是欺骗，不符合事实。“九·一三”事件后，在“四害”横行时编写的党史讲义、两条路线斗争史，又说林彪从投身革命之日起就很坏，一贯反对毛主席，一坏到底，一点事没做，这也不符合事实。如果真的是那样，他怎么能够当上“接班人”呢？难怪有的学生学了这种两条路线斗争史后提出这样的疑问：既然林彪一坏到底，为什么我们党没有能够及早发现，却让他步步高升，爬上“副统帅”的高位呢？实在令人费解。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选集》二卷512页）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历史的考察，这个问题就不难获得正确的答案。

林彪是一个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军内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他的真实面目的暴露有一个过程，我们对他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

林彪生于一九〇七年，湖北黄冈人，又名育容。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毕业后，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一九二八年五月，随朱德、陈毅同志率领的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上井冈山，从此就在红四军、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中工作。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对革命虽作过一些有益工作，但也犯过不少错误。他历任红一军团长、一一五师师长、四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一九四五年六月，在党的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五五年四月在七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随着地位的提高，他追求个人权势的私欲日益滋长。

林彪的个人野心由来已久，“文化大革命”前他就心怀贰志。早在一九五三年，他参与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阴谋活动，暴露了他是有个人野心的。一九五九年九月庐山会议后，他接替彭德怀同志，担任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野心逐步增长。在他看来，身居要职，手握军权，有了实现个人野心的方便条件，他煞费苦心研究策略，寻求怎样攫取更大的权力，进一步爬上去的门径。这时，林彪翻阅了不少古今中外的历史书籍，包括英雄豪杰，历代开国皇帝的传记，研究“政变经”、“登龙术”，让人给他摘录了不少卡片，自己也写了一些黑笔记。叶群专门记载了抓“一号（指毛泽东同志）活思想”的方法，以便“应对”。叶群一再嘱咐林彪的秘书要经常提醒林彪，说话不离主席，举手不离语录，把他的真面目伪装起来。林彪真是挖空心思地钻研施展权术的诀窍，寻求篡夺夺权的捷径。

为什么林彪能够被立为“接班人”，爬上“副统帅”的高位呢？从我国社会的历史条件出发，结合林彪发迹的特点，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的。

一、林彪鼓吹现代迷信，大搞造神运动，标榜“高举”，骗取信任。

林彪深知，在中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有强烈的革命热情和革命传统。在这种条件下，要想爬上去，篡夺最高权力，必须把自己装扮成对毛泽东同志最崇敬最虔诚的忠实信徒，“高举”旗帜，“紧跟”不二，亦步亦趋，才能骗取信任，步步高升。因此，一九五九年九月，他刚就任国防部长，便在全军高级干部会上提出所谓“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鼓吹“三忠于”、“四无限”，开展“背警句”、“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的群众运动；狂热地颂扬领袖的“天才”，“大树特树”绝对权威，大搞造神运动。林彪的这套货色，大家非常熟悉。打开《林彪语录》，许多“警句”触目皆是，这里就不再列举了。

林彪搞的这种“造神运动”，骗取了人们的信赖，误认为他是“高举”、“紧跟”的“最好学生”，“光辉典范”。他当“接班人”，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当之无愧的。

二、毛泽东同志对林彪的信任和赞赏。

林彪从一九二八年五月上井冈山起，一直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工作，得到毛泽东同志的器重。

林彪上井冈山后，多次说过：“现在边界很困难，只有红米、南瓜是不行的，一定

要打出去，不然就没有办法维持”。他还多次提出要离开毛泽东同志去分散打游击，并且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毛泽东同志认为，“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題，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因此，针对林彪的右倾悲观思想，于一九三〇年一月写了一封长信给他，严肃地批评了他的右倾悲观和不要革命根据地的流动游击的错误思想，目的还是在耐心教育他。一九四八年中央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打算把这封信收入，林彪闻讯写信给中央说：“我同意在党内外公布这封信。为不使引起误解，我同意公布信的内容，而不公布我的名字。”经毛泽东同志同意，此信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改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将点名批评林彪的那部分删去了。这说明毛泽东同志那时对林彪的批评是从爱护出发的。

一九三八年三月，林彪在山西隰县附近，穿上日本“皇军”的大衣，骑上高头大马抖威风，被阎锡山顽军误认为日军打中负伤。毛泽东同志特地去电促其来延安疗养一段时期，并告诉他：“这是中央的决定，必须坚决执行。”四月十日下午，林彪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骑马奔驰三十多里路，赶到拐岭八路军总医院看望。以后，还送林彪到苏联去治伤。

一九五六年九月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主席时，毛泽东同志就有选林彪当“接班人”的意图。当时毛泽东同志未得全票，少了一票，谁不选毛泽东同志当主席呢？结果是毛泽东同志未选他自己，他投票选林彪当主席。这一票说明毛泽东同志当时对林彪是十分赞赏和信任的。以后中央分一线、二线，毛泽东同志也是这样打算的：让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处在一线，处理日常工作，他退居二线，让林彪好好休息，养好身体，一旦帝、修、反打起来，就让林彪出来，协助他指挥战争。

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后搞的一套“突出政治”着重从政治上建军的东西，毛泽东同志是十分赏识的，曾多次表扬过。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同志写信给贺龙、聂荣臻同志，称赞“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很大的一个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要求工厂企业单位都要学解放军，建立政治部，实行四个第一、三八作风。认为“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以后又号召全国学解放军。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接见海军干部工作会议人员、《解放军报》编辑和记者、战士演出队时又赞扬林彪说：“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

一九六二年一月，中央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本来是纠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总结经验教训的。毛泽东同志在大会上公开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并且要求传达到全党，与会同志受到很大教育。但林彪却与众不同，在会上大讲“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的体会，他的突出优点是实际，总是与实际八九不离十，……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当前出现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毛泽东同志对林彪的这篇讲话很满意，甚至还对林彪说了很感激一类

的话。

对林彪的生活、健康问题，毛泽东同志也给予极大的关怀。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写信给林彪说：“你的来信早收到了。身体有起色，甚为高兴。开春以后，宜到户外散步。你对两个文件（指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两个文件）的看法是正确的。”信里还特别提醒林彪要注意“养生之道”：“曹操有一首题为《龟虽寿》的诗，讲养生之道的，很好，希望你找来一读，可以增强信心。”毛泽东同志还特地亲笔把曹操的四言诗《龟虽寿》抄录下来，附在信中，送给林彪，鼓励林彪养病的信心。由此可见，毛泽东同志对林彪的关心和爱护可以说无微不至。

一九六五年取消军衔制，恢复红军时代的领章、帽徽，都得到毛泽东同志的赞赏。一九六六年五月六日，林彪向毛泽东同志报送总后勤部的报告，毛泽东同志看了立即回信，提出要解放军和各行各业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大学校，即“五·七”指示。这实际上是反映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左”倾空想的社会主义模式。林彪和江青合伙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毛泽东同志为之亲自审阅、修改、定稿。林彪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接见曾思玉、刘丰的讲话，都是经过毛泽东同志亲自审阅过的，认为“很好”而后决定下发的。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彭罗陆杨以后，林彪又回到大连养病。七月十八日毛泽东同志从武汉回京，决定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要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八月四日夜十二点，毛泽东同志叫杨成武同志通知空军准备飞机，又叫秘书徐业夫告诉林彪立即回来。林彪在吴法宪的陪同下，连夜乘飞机回京。八月五日，毛泽东同志发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经过八届十一中全会，林彪就成了“副统帅”。

这里顺便说一个问题：毛泽东同志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致江青信是否真的？怎样理解这封信的精神？

毛泽东同志在湖南湘潭县韶山滴水洞看到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非原则地颂扬他的讲话很不满意，便写了“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这封给江青的信。林彪知道后很紧张，叫叶群在各种场合一再表白，说什么林彪是“好心”呀，主席这一批语，别人要“利用”呀，“主席喜欢的人才这样批评”呀，等等。毛泽东同志为了安定林彪，说：“只要今后改正这种作法，可以把他的信烧掉，信的内容不再下达”。烧信时专门找叶群到场。当时戚本禹认为，毛主席写的东西都是宝贝，烧了真可惜。他向周总理表露了这种心情。总理说，不要紧，我那里有一个抄件，我叫陶铸抄了一份。以后，批林整风中印发出来的这封信，就是照抄件翻印的。总之，原信已烧，抄件还在，这封信是确有其事的。

有人认为，毛泽东同志在这封信中已看穿了林彪的本质，当时是为了先搞刘少奇就不动林彪。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还是领袖“高瞻远瞩，洞察一切”的“天才论”观点，领袖是人不是神，他的认识也不是一次完成的，同样要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应当说，毛泽东同志在信中只是看到了林彪在思想理论上的错误观点，对林彪的本质并未看穿。因此，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才让林彪当了“接班人”。说那时就看穿了，是不符合事实的。

一九六九年四月召开九大，选举大会主席团时，毛泽东同志曾在大会上提出要选林彪当主席，他当副主席，被林彪装模作样地连续不断地“毛主席万岁”的高呼声打断了。

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是怎样写进九大党章的？

规定林彪为“接班人”，最早见之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末中央《关于征询召开九大的通报》。这个文件是康生、姚文元起草的。其中写道：“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彪，进一步提高林彪的威望，……”后来经过修改，便成为九大党章中的一段。林彪在这段文字上言不由衷地批道：“全文删去或改写”。毛泽东同志不同意，当时的中央碰头会也不同意。这种违反马列主义和党的原则的“预立储君”的做法公然出现，说明我们党当时对林彪的本质缺乏认识，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封建专制遗毒影响之深，应当作为教训，引以为戒。

三、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定林彪为“接班人”的特殊情况。

林彪被选定为“接班人”，固然和毛泽东同志有重大关系，但并非他个人任命，而是通过八届十一中全会选举的，当时还是得到相当多数同志拥护的。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这要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进行分析。

从当时常委的情况来看。八届一中全会选出常委六人，一九五八年五月八届五中全会又增选林彪为常委、副主席，这样常委就是七人了。在七人常委中，除毛泽东同志而外，刘少奇同志（1898—1969年），邓小平同志（1905年生）当时被指控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是被炮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对象，当然不可能再当“接班人”了；陈云同志（1905年生）一直被指责为“右倾”；朱德同志年纪大了，他生于1886年，比毛泽东同志年长七岁；周恩来同志常说：我这个人是不能挂帅的。毛泽东同志对周恩来同志也“不太满意”，而林彪是当时七人常委中年纪最轻的（他生于1907年，当时只有59岁）。周恩来同志说，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常委中只好是他当接班人，这是很自然的”。

从林彪本人来说，他有一定的“政治资本”。“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既无战功，又无政绩；而林彪却不同，他是赫赫有名的十个元帅之一，名列朱德、彭德怀同志之后，位居第三，从黄埔参军起，经过北伐、南昌起义、上井冈山、反“围剿”、长征、抗日、解放战争，打过仗，有战功。

林彪不但在军事上搞了一套新花样，什么“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等等，很迷人；而且在政治上又打着“高举”的旗帜，掀起所谓群众性的“活学活用”运动，赢得了不少声誉。这样，就被人认为是“武能安邦，文能治国”的“文武全才”，“是最理想的接班人”。

据说，贺龙同志听到了林彪五·一八讲话后说：“原以为林彪这几年光养病了，那知他读了这么多书，有学问，我就吃了不看书的亏”。象贺龙同志这样久经锻炼的老同志，竟然被林彪的假象所蒙骗，一般人就更要受骗上当了。

还有林彪的亲信为他评功摆好，大造舆论，也起了欺世盗名的作用。一九六〇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时，报刊上接连刊载周赤萍写的《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

彪》，李作鹏写的《东北战场上的辽沈大决战》，《三下江南》，梁兴初写的《南渡松花江》、《黑山阻击战》等文章，大肆吹捧林彪，称林彪为部队的“统帅”、“非凡的天才”，“一贯正确的英明领导者”，“具有非凡的战略远见和伟大气魄”，为林彪捞取了不少政治资本。此外，甚至日本也出版了寺尾五郎写的《林彪的作战》，高度赞扬“林彪是毛泽东思想最忠实的继承者和捍卫者”，反映了世界舆论对林彪的好评。

由于林彪装出“最最革命”的姿态，利用革命领袖的威望，煽动宗教式的狂热，把自己说成什么“举得最高”、“跟得最紧”、“永远忠于领袖”。他玩的这种手法，确实在一个时期内迷惑过相当一部分干部和群众，甚至我们党内一部分高、中级干部也未察觉。邓力群同志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二日在党校作报告时曾谈过他对林彪的认识过程。他说：“就我个人来说，对于林彪，一直到庐山会议，都没有发生什么怀疑。虽然我觉得他的一些提法不妥当，但是他拥护毛主席，我是相信的，认为把他选为接班人是很好的。我也跟别人讲过，说历史经验证明，一个伟大的人物需要由另外一个伟大人物来维护他。马克思需要恩格斯来维护，列宁需要斯大林来维护，毛主席需要林彪来维护。我就是这样看的。东北解放以后，我脑子里想，也跟一些同志交换过意见：原来主席是想让刘少奇当接班人。在东北全部解放以后，我认为刘少奇当接班人不如林彪好。因为刘少奇政治上强，但是他不会打仗，而中国这个国家只是政治上强，不会打仗，这个接班人是很大的缺陷。林彪政治上强，又会打仗，我看这个人将来当接班人最合适了”。邓力群同志原来对林彪的看法，代表和反映了不少高、中级干部当时对林彪的认识。

再从当时党内的状况来看，从一九五七年以来，个人崇拜、“一言堂”盛行，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党的领导逐渐变成封建家长制的个人专断。许多重大问题常常是毛泽东同志个人说了算，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受到破坏。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已经确定林彪为接班人，情况十分明显，即使有的同志对林彪不满意，在那种气氛下也不便公开表示反对的意见，为了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威信，顾全大局，也只好投赞成票。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不正常情况下的选举，免去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四同志的副主席职务，而使林彪成了党中央的唯一副主席。

（二）林彪集团和“四人帮”的关系

林彪、江青反革命阴谋集团，是以林彪为头子和以江青为头子的两个帮派相互勾结、相互利用，逐步发展形成的一团两伙。林彪、江青一伙，既有共同的反革命目的和共同的阴谋活动，又有各自的反革命野心和各自的阴谋活动。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他们狼狈为奸，结成反革命阴谋集团。同时，又各自组成帮派体系，明争暗斗，互相争权夺利。

一九六二年至六八年间，林彪、江青互相勾结，互相利用，互相吹捧，进行篡党夺

权的罪恶活动。林彪要利用江青的特殊地位，江青则要借助林彪作“护法尊神”，这样，他们就互相勾结起来。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是他们相互勾结的第一步。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一日，江青为了借助林彪的地位和权势，实现她的政治野心，由上海赶到苏州，以“文艺革命”为题目，同林彪密谋勾结。一月二十二日，林彪给总政治部下达指示：“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强，在文艺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二月二日至二十日，江青在上海召开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她在会上宣称，“在文艺方面，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这条文艺黑线专了我们十七年的政”，“该是我们专他们政的时候了”，“一定要搞掉这条黑线”。这条黑线“在三十年代的后台是王明，现在的后台是刘少奇”。随后，林彪、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人炮制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制造“文艺黑线专政”论，阴谋陷害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这是林彪、江青进行篡夺夺权所采取的一个严重步骤。

一九六七年一月，林彪任命原来并无军籍的江青为中央军委文革小组顾问。同年九月，林彪又任命江青为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使江青得到指挥部队文艺工作的权力。一九六八年三月，林彪在接见军队干部时的讲话中，吹捧江青“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的干部中很杰出的干部”，“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期间，就看出她的伟大的作用”。林彪、叶群还指使江腾蛟等人，到上海、苏州一带去抄三十年代文化人的家，把抄来的有关江青三十年代丑闻的资料统统焚毁，为江青销毁历史罪证，深得江青的好感。江青对叶群说，你有什么仇人告诉我，我替你报仇。

江青为林彪爬上“副统帅”的地位十分卖力。一九六八年十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江青坚持要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入党章。她吹捧林彪“很有无产阶级革命家风度。他一再声明身体不好，没做多少事，其实并非如此”，“他那样谦虚，就在党章写上他”，“这一条不写上我们通不过”。一九六九年九大前夕，在中央讨论党章的会议上谈到是否应该写上接班人时，江青宣称“林副主席的名字还是要写上，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同一期间，张春桥在上海宣扬：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在党章上了，这就放心了”。江青还为林彪拍摄照片。一九七一年刊在《解放军画报》上的一张林彪故作姿态学习《毛选》的大幅光头照片，就是江青拍摄的（署名峻岭）。

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一年，随着林彪、江青一伙的主要成员在九大以后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篡夺了党和国家很大一部分权力，在他们这一帮野心家内部，以林彪为头子的一伙同以江青为头子的一伙，逐渐发生了争夺权力的斗争。这个斗争首先在一九六九年四月召开的九大上表现出来。林彪集团操纵选票，布置他们的党羽少投江青的票，结果江青少得六票，十分不满，为此还要进行追查，被毛泽东同志制止了。九届二中全会是林彪集团和“四人帮”争夺权力斗争激化的表现。林彪集团耽心林彪的“副统帅”地位不稳，怕被“四人帮”夺走，急于夺取国家最高权力，便在庐山会议上指名道姓地骂康生、张春桥是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要揪出来，千刀万剐，目的是想压一下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这伙人，表明他们才是最坚决捍卫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是有力

量的，以便进一步篡权。当时只揪出了陈伯达，吴法宪、汪东兴作了检讨。叶群为了搞合一团两伙的关系，还亲自带着几员大将去向江青道歉，承认错误。毛泽东同志当时还保护了一下林彪：一是把“称天才”的语录中摘引林彪的话删去了；二是在《我的一点意见》的末尾，加上了“我和林彪一致认为”这句话，以示林彪和陈伯达有所不同。

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集团被粉碎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利用职权，掩盖他们与林彪勾结的真象，伪装成反林彪的“英雄”，蒙混过关。一九七二年九月，王洪文由上海调到中央工作后，成为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核心成员。从此，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正式组成“四人帮”，更加疯狂地进行阴谋活动。（这方面的情况另有专题，不赘）

（三）林彪反革命集团形成的几个主要问题

林彪集团从反党到反革命有一个发展过程。前面讲过，林彪的野心由来已久。林彪集团形成的过程大致是：在宗派主义的基础上，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时机，网罗亲信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同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互相勾结，进行篡党夺权、祸国殃民罪恶活动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以后，又随着他们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不断暴露而逐步走向破产，直到一九七一年九月自我爆炸，归于覆灭。在一九七〇年八月九届二中全会以前，主要是利用左倾路线，并把它推向极端，大搞篡党夺权的反党阴谋活动；在九届二中全会上阴谋败露，便制定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密谋杀害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其他同志，变成赤裸裸的反革命集团。

林彪集团的反革命策略主要有三条：一是鼓吹现代迷信，大搞造神运动，骗取信任。正如林彪不打自招供认的，“不说假话办不了大事，不称天才成不了伟人”。他是玩弄两面派手法的能手，是举世罕见的现代“造神家”。这方面的情况，前面已讲过，不赘。二是诬陷忠良，排斥异己，扫除障碍；三是网罗党羽，培植亲信。林彪是怎样施展后两条反革命策略的呢？下面结合林彪集团形成、发展的过程来揭露。

一、策划打倒彭、罗、陆、杨，开始篡党夺权第一步

在林彪看来，谁妨碍他篡党夺权他就整谁。经过庐山会议，彭德怀同志被整下去了，朱德同志也被他批了一通；总政主任罗荣桓同志不同意林彪把毛泽东思想简单化庸俗化的一些提法和做法，也挨过林彪的批，而且已在一九六三年去世。这几个老上级、老同志都已扫除。林彪认为，第一个直接妨碍他篡权的就是：掌握军队日常工作领导权的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副总理、书记处书记罗瑞卿同志。经过一番密谋策划，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不久，林彪瞅准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机已经到来，便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底对罗瑞卿同志先下毒手了。

罗瑞卿同志当总长，本来是林彪提名的，为什么一九六五年底他又要拿罗瑞卿同志“开刀”呢？据林彪自己说：头一、二年，罗与他合作得比较好。后来么，罗就不听他的

了，有事也不向他请示汇报，甚至逼林彪“让贤”、“让位”，他才发现罗有野心，因此下决心向毛主席报告，拿掉罗。

这统统是骗人的谎话。林彪整罗瑞卿同志的根本原因，是因为罗对林彪搞的什么“顶峰”、“最高最活”，以突出政治为借口制造军政对立，破坏战备的一套东西，进行了抵制和斗争，成了他篡党窃国的首当其冲的直接障碍，因而采取种种卑劣手段，捏造罪名，肆意进行诬陷和迫害。

当姚文元文章出笼不过三周，林彪得知杨尚昆同志已调离中央办公厅时，立即发难整罗瑞卿。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林彪写了一封亲笔信，指派叶群带上事先指使人写好的诬陷、揭发材料，到杭州向毛主席告状。叶群一连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七个小时。十二月二日，毛泽东同志写了批评罗瑞卿同志的反对折中主义的批语。

十二月八日至十五日，党中央召开上海会议。叶群在会上发言三次，讲了十一个小时，并印发叶群带来的诬陷材料，作为会议主要文件。极端保密的会议开了三天以后，才突然打电话，派飞机把正在西南视察工作的罗瑞卿接到上海，立即隔离起来，进行了背靠背地揭发批判。揭发材料是林彪指使李作鹏等人捏造罪名，任意诬陷写成的。然后由林彪上报毛泽东同志，未经核实会议就印发了。

林彪一伙诬陷罗瑞卿同志的主要罪名是逼林彪“让贤”。即叶群所说的，罗瑞卿在一九六五年二月要刘亚楼转达的四条意见：林彪早晚要出政治舞台；照顾好林彪；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放手让罗管。“办好了总长不会亏待你的”。这四条纯属捏造，无论怎样逼供，找出多少人的证明，罗瑞卿同志从来也没有承认过。叶群在上海会议发言后，见罗不承认，心里着慌（当时邓小平同志说：刘亚楼已死，死无对证），就赶紧找人证明。十二月十五日，让其女林立衡写了假证明；二十五日，又找吴法宪写了假证明；还找刘亚楼妻子写了假证明。这几个人现在都承认，那是叶群一手导演叫写的，他们根本没有听说过。这完全是制造伪证，蓄意进行政治陷害。

林彪、叶群等还无中生有地说，罗瑞卿在背后讲毛主席的怪话，对毛主席不满，不尊重老帅和中央其他领导人，进行挑拨离间，罗瑞卿同志在被关押审查期间，林彪一伙竟然灭绝人性地提出医疗要为专案服务，以治疗腿伤为要挟，逼迫罗瑞卿同志承认强加的罪名，而罗瑞卿同志坚贞不渝，视死如归，坚持斗争。最后，他们竟下毒手，将罗瑞卿同志的胫骨锯断，造成终身残废，以致早死。

林彪整罗瑞卿同志，开创了党内用突然袭击的手段整人的恶劣先例。从此，林彪以此为口实，上下左右搞株连：罗瑞卿同志的上级，为罗受诬害说过几句公道话的，就被指责为包庇罗，是罗的后台，如整邓小平、贺龙同志就是这样妄加罪名的；同级的，被斥为连在一块的“难兄难弟”，如整彭真、陆定一、杨尚昆同志，就施用这种伎俩；如是罗的下级，就斥之为罗的“爪牙”，公安系统、总参谋部不少干部受株连，就是这样造成的。林彪整罗瑞卿同志是“整人立威，杀一儆百”。同时，林彪通过整罗，又进行拉帮结伙，网罗党羽。例如，李作鹏、吴法宪能按照林彪的旨意写假材料，上海会议用上了，被认为是忠于林彪的一伙。以后当他们受冲击时，林彪、叶群出面死保，这些人就死心塌地的追随林彪，成了林彪集团的核心成员。

诬陷陆定一同志是林彪一手策划的，其主要借口是严慰冰同志写匿名信的问题。

林彪授意别人捕风捉影地整了一份所谓《陆定一是严慰冰反革命幕后主使人的八大证据》，硬说严慰冰的言论行动（包括写信）都是陆定一同志指使的，他们开的是夫妻店，通过写匿名信方式来迫害林彪一家，挑拨林彪和党中央领导人之间的关系。

严慰冰同志从一九六〇年六月至一九六六年二月间，写了二十多封信给林彪、叶群。寄信人用过北京按院胡同王光的名义（即王光美同志母亲所办托儿所所在地），还用过了张少华的名字。林彪抓住这点大做文章，说写按院王寄，是挑拨林彪和刘少奇的关系；写张少华（毛主席的儿媳妇叫邵华）是挑拨林彪与毛主席的关系。更可笑的是抓住严慰冰被捕前（一九六六年四月被捕入监）不久，陆定一从上海给严写信谈买手表的事，说有三防的男表、女表，全钢、半钢。林彪穿凿附会地说，全钢、半钢无锡话是“全讲、半讲”，说这封信是订立攻守同盟，这纯粹是捕风捉影，任意编造，陷人于其罪。

今年上海出版的《青年一代》杂志第三期上发表了一篇严慰冰同志的访问记，其中谈到严慰冰同志系老革命家严仆同志之女，她于一九三八年在延安抗大学习，知道林彪的老底，曾“亲眼目睹林彪、叶群的许多劣迹，深知林彪品质不好”。对林彪不满，便写信骂林彪，“骂林彪是言之有据的，方法当然不足为取”。她还说，“她反对林彪，只是做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不值得宣传”。

批彭真同志，改组北京市委，这是毛泽东同志的意图，中央的决定。同时，林彪诬陷彭真同志，也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林彪在一九六六年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借批判彭罗陆杨提出所谓政变问题的蛊惑人心的讲话，大念“政变经”，有预谋地在党内制造了极度紧张的气氛。他诬陷彭罗陆杨是“四大家族”，联合起来搞政变，还诬陷彭真同志在晋察冀时执行王明路线，“比王明路线还王明路线”。彭真同志在会上申辩说：搞政变、颠覆中央，里通外国，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林彪马上插话，恶狠狠地说：其实，做梦也没有忘掉。林彪把搞颠覆、搞政变的大帽子扣到彭罗陆杨头上，就是把他们置之死地不许辩解。彭真同志在会上多次要求中央进行审查。

在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中，杨尚昆问题揭得最早，大约是在一九六五年十月左右，就被调往广州，改组了中央办公厅领导班子。给杨尚昆同志定的罪名是“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把大量的机密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给别人抄录，严重泄密”；“同罗瑞卿关系不正常，积极参加反党活动”等。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诬陷杨尚昆同志是“反党集团的情报部长”。

这里附带说一下：毛泽东同志对林彪“五·一八讲话”的态度如何？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在江青的信中说得很清楚：“他们一些提法，我总感到不安”，“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意志为转移吧”。康生于九月代中央起草了转发林彪“五·一八”讲话的通知和批语，九月十六日报送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于九月二十二日批了“照发”。对中央的批语“……他对毛泽东思想做了全面地、正确地、科学地评价”一句作了修改，将三个“地”字都改为“的”，并批：“评价是名词，不是动词，因此，它的前面只能用形容

词，不能用副词”。

总之，林彪策划打倒彭罗陆杨，为他篡党夺权扫除了一大障碍，夺得了一些权力，也搜罗了一些党羽。

二、残酷迫害贺龙同志致死

林彪整垮了他篡党夺权的第一个障碍罗瑞卿同志后，又玩弄阴谋手段，栽赃陷害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同志。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不久，林彪便授意吴法宪、李作鹏写了诬陷贺龙同志插手空军、海军的材料。九月，叶群捏造材料，口授给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原处长宋治国，指使宋写诬陷贺龙的材料。材料送交叶群时，还让秘书看着，当面问宋治国，是你写的吗？马上让秘书写出证明材料。林彪连同吴法宪、李作鹏写的材料，一并转报毛泽东同志。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林彪说，贺龙指使王尚荣要夺总参党委的权，这就是“八·二五事件”。

九月八日，林彪便在军委常委会上诬蔑贺龙同志“搞颠覆活动”，“到处发现他伸手夺权”，咒骂贺龙同志是“土匪”、“大阴谋家”。

一九六七年春，叶群诬告贺龙同志历史上有问题，提出要立案审查。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经毛泽东同志同意，建立专案审查，康生任组长。直至一九六九年九月被迫害致死。（详情见薛明同志的文章《向党和人民的报告》，此处从略）。

所谓贺龙同志的历史问题，主要是指一九三四年八月，贺龙在湘鄂西根据地时处决了蒋介石派来充当“说客”的熊贡卿一事。此事湘鄂西分局早已报告中央，专案组也从中央档案馆复制了十多份。这件证明贺龙同志坚贞不屈的原始材料，专案组藏匿不报，以致铸成冤案，将贺龙同志残害致死。

贺龙被整死，原红二方面军的高级干部二十多人受株连，许光达同志竟被迫害而死。林彪集团乘机又夺得不少的权力。

三、诬陷、迫害刘少奇同志和邓小平同志

在一九六六年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判彭罗陆杨时，刘少奇同志曾被迫作过检讨，林彪一眼看出毛泽东同志对刘少奇同志不满。到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矛头就更明显了。因此，林彪在十月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和一九六九年三·二〇讲话中，多次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同志，这些不赘述，下面讲一点新的材料。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一、十二日，叶群两次找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谈话，向雷英夫提供十二条诬陷刘少奇同志的材料。然后，雷英夫按照叶群的授意写成材料。八月十三日，林彪看了雷写的材料。八月十四日，林彪对雷英夫说：用你写信的形式，把材料送给我，由我转批，“这样就更政治化些”。当天，林彪将雷英夫写的材料批给江青，由江青直报毛泽东同志。这封信的内容直接涉及王光美。很明显，这完全是一种阴谋活动。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九日，林彪看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用各种非法手段刑讯

逼供，制造伪证，栽脏陷害，炮制出来的所谓刘少奇的罪行审查报告，在上面批道：“刘贼五毒俱全，铁证如山，罪大恶极，令人发指”，是“特大坏蛋”“最大隐患”。把他挖出来，要“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功的江青同志致敬！”这是林彪、江青互相勾结诬害刘少奇同志的又一罪证。

林彪除在许多场合公开点名诬陷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外，单独打击邓小平同志有这样几次：

（1）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刘少奇同志的“错误”。林彪把矛头主要对准邓小平同志，他赤膊上阵，攻击邓小平同志在处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注释问题上是为二野和自己评功摆好。事实上，邓小平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秉公处理和克己的。林彪特别攻击邓小平同志和吴晗同志打扑克，说是打政治扑克，属于敌我矛盾。这样，迫使小平同志当场向康生交待工作，即当场交权。

（2）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林彪在一份反映邓小平问题的材料上（所谓“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要搞社会强制，现在苛捐杂税太多，”）亲笔写上批语，报给毛泽东同志。大意是说，邓对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的态度是指桑骂槐，骂解放军。这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3）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林彪在一次会议上破口大骂邓小平同志是“黑帮分子”、“坏分子”、“反党分子”。

四、反击“二月逆流”整老帅。

所谓反击“二月逆流”，这是林彪、江青、康生合伙炮制的迫害老一辈革命家的一个重大政治事件。其目的是想通过打倒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老同志，进而打倒周恩来、朱德同志，为夺取最高领导权扫清道路。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王力奉江青之命向林彪汇报所谓大闹怀仁堂的情况，讲到徐向前同志责问江青一伙“你们还要不要解放军”时，林彪说，他不能代表解放军。

二月十七日谭震林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斥责江青一伙“真比武则天还凶”，手段的毒辣是党内没见过的，把老干部“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谭震林同志坚毅地表示，“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决不允许他们如此蛮干”，“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拚下去”。这些话真是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象一把锋利的匕首，直刺林彪、江青一伙的心脏，代表了老一辈革命家的浩然正气，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正义呼声。

林彪二月十九日在信上批道：“想不到谭震林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颠倒是非，为整老同志定了调。林彪把信报给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只批已阅，未表态。林彪把批件撕碎扔到痰盂里，后由秘书拾出来洗净拼复原状。

毛泽东同志听信了江青、张春桥、王力等人的错误汇报，严厉地批评了老帅们。决定二月二十二至三月十八日在怀仁堂开批评会，开展对陈毅、徐向前、谭震林等同志的批判围攻。叶群也参加了，是重要打手之一。

反击“二月逆流”的后果是：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七个政治局委员被打下去，从此中央文革完全取代了政治局，军委常委也不能正

常行使职权，处于半瘫痪状态。党政军大权基本上被林彪、江青一伙所把持。

一九六八年十月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江青伙一继续对老师们展开全面围攻。八届十二中全会是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议程并无批“二月逆流”的内容，怎么又搞起来了呢？

毛泽东同志在开幕式讲话中提出，“文化大革命”究竟对不对？是否必要？成绩是不是主要的？康生、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等人以此为借口，搞了一个中心发言记录发到全会，就批起“二月逆流”了。定的调子是“二月逆流”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有计划地把老同志分别编入六个大组（按大区分），分割包围，以便围攻批判。除在怀仁堂受批判的六位老同志（谭震林同志被诬为“叛徒”。未到会）继续遭围攻外，连谷牧、余秋里同志也挨批（被诬为“两个帮凶”），有些人在发言中还指名攻击了朱德、陈云、邓子恢三位老同志（被诬为三个“老右倾”）。其他一些中央委员如蔡畅、胡耀邦、陈少敏、李志民等同志也遭批判。

林彪原想把简报上攻击老同志的话都引到总结中去，再加以上纲上线，但被毛泽东同志制止了。所谓“二月逆流”是六七年二月发生的，早就批过了，这些老同志已靠边站，不管事了，为什么时隔一年半，又拿出来批呢？林彪，“四人帮”这样干，其目的就为召开九大把老同志打下去做准备。千方百计地破坏老同志的威信，让他们说话没有人听，做事没有人帮，在九大召开时被排挤出政治局，然后再把他那一伙塞进来。这次围攻老同志，确实做了这方面组织准备和舆论准备。

五、与江青合谋制造“杨余傅事件”，篡夺军委领导大权

1968年3月24日，林彪和江青相勾结，用阴谋手段制造了一起轰动一时的大冤案——“杨余傅事件”。林彪当场宣布逮捕所谓叛徒余立金，撤销杨成武总参谋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职务，撤销傅崇碧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温玉成为副总理兼北京卫戍司令员。

关于余立金的所谓叛徒问题，完全是诬陷的，1967年有人揭发说，皖南事变突围时，有人看到国民党兵押着几个新四军，其中有一人象是余立金。吴法宪早就知道此事，到68年春，他和余立金的矛盾尖锐了，吴法宪就转报上去，余立金就这被打成了“叛徒”。后经多方调查，根本无人能证明余立金被捕过。相反，却有好几人证明是和余立金一起突围，化装到上海的。李一氓同志便是和余立金一道去上海的。因此，给余立金同志戴上叛徒帽子纯属诬陷。

关于傅崇碧“武装冲击中央文革”的事实真象，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的文章基本上讲清楚了。

原来，1968年3月初，北京鲁迅博物馆的群众组织写信给江青，说是鲁迅书信手稿丢失了。江青要傅崇碧回去过问这件事。查问的结果是：鲁迅书信手稿原存鲁迅博物馆，后转到文化部；1967年6、7月间，江青已派戚本禹从文化部取走，并且开有收条。这些手稿已交给中央文革的保密员。傅崇碧同志为了当面汇报清楚这件事，3月7日与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的秘书联系好，然后带领三位同志，分乘两辆汽车赴中央文革所在地钓鱼

台，得到允许后才驱车进入。路上遇见姚文元，一齐走进会议室。但未料到，江青一进门就气势汹汹地吼叫：“傅崇碧，你带这么多人到我这里来干什么？你身为卫戍司令，不经请示就冲进来，你要抓人吗！你懂不懂纪律！……”面对江青的淫威，傅崇碧同志坚持说明这些手稿和管理手稿的人都在中央文革。江青却说不可能。傅崇碧同志把写着收管手稿人名字的条子交给她，并指出存放手稿的地点。然后把装着书信手稿的箱子打开，果真全是鲁迅书信手稿。江青无言以对。

3月8日还召开了一次警卫会议，为了维护江青的“尊严”，批评了傅崇碧，搞了几条规定，如必须先打电话经过允许；只进一人，不许带人；文件不要直接送，统由中办秘书局转；不许带武器等等。问题已经解决了。隔了两周以后，又把此事翻出来，硬说是杨成武指使干的。这是用林冲误入白虎堂的手法进行政治陷害。他们进钓鱼台大门是得到陈伯达的秘书同意的了，怎么说是“冲进去”的呢！当时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确实对傅崇碧同志采取了保护措施。会上宣布撤销了傅崇碧的卫戍司令员职务，同时调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后经毛泽东同志批示，把他家属也送去沈阳。当然他这个副司令员是没有权的，处于被隔离审查状态，不断写交待材料，就这样度过了七年。

林彪为什么要整杨成武同志呢！

林彪在“三·二四”大会上宣布杨成武的罪状是：同余立金相勾结，要打倒吴法宪，夺空军的权；同傅崇碧相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有野心，想排挤黄永胜等。林彪还说杨成武的主要错误是山头主义、两面派，政治品质很坏，两面三刀，整江青的黑材料等。这些罪名，全是无中生有，无限上纲。

根本原因是林彪对杨成武心怀猜忌。1967年夏，杨成武随毛泽东同志视察大江南北。林彪怀疑杨在毛泽东同志面前说过林彪的坏话。有一次，林彪问杨，主席问过我什么情况，你怎么说的。杨说没讲什么。其实，毛泽东同志曾对杨讲过：林彪封我四个官儿（即“四个伟大”）。可能林彪听到什么风声，而杨没有告诉他，引起林彪的猜疑。还有，1967年3月，林彪告诉杨，不要送文件给叶帅。杨请示周恩来同志后，继续照送。9月下旬，杨随毛泽东同志视察回京后，曾到一些老师家里去传达过毛泽东同志视察时的谈话内容。1967年9月下旬，杨成武被任命为军委办事组组长后召开第一次会议就明确宣布：办事组对军委常委负责，重大问题要向常委请示汇报。杨确实按照周恩来同志指示，对老师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大约这些就是林彪指责杨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内容。

整杨的直接导火线是：空军党委办公室王飞等人随意关押余立金的秘书。杨接到揭发王飞等人的信后，要吴法宪处理。吴反向林彪告状，诬陷杨余勾结要夺权。同时，林立果正送给空军党办王飞等人培养，整党办的人就是整到叶群、林立果的头上来了。因此，便捏造出杨、余勾结要夺吴法宪权的罪名。

江青为什么要和林彪勾结起来整杨成武呢。因为从上海、北京弄到的一些有关江青在三十年代丑闻的材料，都存放在杨成武那里，杨成武感到不好处理，一直未动。江青得知，勃然大怒，说你想放长线钓大鱼吗！后来这批材料经林彪批准，在中南海内销毁了。

“三·二四事件”后，3月25日改组了军委办事组，由黄永胜、吴法宪分任正、副组长，成员为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不久，决定军委常委不再开会，办事组取代了军委常委。这天，李作鹏写信给林彪，指控叶帅是杨成武的后台。后来，又扬言杨成武、傅崇碧长期在晋察冀、华北地区工作，暗示聂荣臻、徐向前同志也是他们的后台。从此，黄永胜等不再给老帅们送文件，军队的领导权基本上操纵在以林彪为头子的，黄、吴、叶、李、邱为主要骨干，以办事组和空军为主要活动阵地的这一伙人手中，林彪集团得到进一步发展。

六、九大是林彪集团发展的顶峰

为什么九大是林彪集团发展的顶峰？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障碍扫除，大权到手，名正言顺，羽毛丰满。

所谓障碍扫除，就是说，从整罗瑞卿同志开始，以后诬陷贺龙同志，整老帅，制造杨余傅事件，这时，被林彪集团认为障碍他们夺取军队领导大权的人都已扫除了，有的被整死，有的整垮，有的靠边站，有的被半打倒。总之，除林彪以外，没有一个老帅还能管事了。他篡权的主要障碍都已扫除了。

所谓大权到手，就是说，不仅军队的主要权力已经掌握在林彪和他的亲信、党羽手中，而且地方上的党政财文大权，通过“三支”“两军”，不少也落入林彪集团之手。如中央、国务院不少部门都已实行军管或派有军代表，当时四机部、六机部、国家体委归李作鹏分管，五机部归邱会作分管，二机部由吴法宪分管。各省市不少是林彪集团所把持，如江西的程世清，上海的王维国，浙江的陈励云，广东的丁盛等。

所谓名正言顺，就是说，九大党章已规定林彪为接班人，林彪的“副统帅”地位已用法定形式固定下来。这是封建性的遗迹，完全违背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是同无产阶级党的性质根本不相容的。也是国际共运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林彪在九大上继续玩弄两面派手法，假惺惺地挤出几滴眼泪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他林彪，他如果在贺龙手下早成了段德昌了。其实，杀害段德昌的是当时在湘鄂西搞肃反扩大化的夏曦，根本与贺龙无关。

所谓羽毛丰满，就是说，林彪集团的主要骨干和亲信黄、吴、叶、李、邱等人，都已进入政治局，掌握实际权力；在中央委员会中，军队干部占45%，其中不少人是林彪集团的党羽，如程世清、梁兴初、陈仁麒、丁盛、刘兴元、刘贤权等。一方面林彪、“四人帮”在政治局中占据半数以上，另一方面，不少老同志都被排除在政治局之外，如李富春、陈云、陈毅、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等。由于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等的坚持，朱德，叶剑英、李先念、刘伯承等同志才保留在政治局内。

林彪集团在九大选举时要阴谋，肆意进行破坏。投票前，他们布置各代表团，指定选哪些人，不选哪些人。因毛泽东同志说过，要选老帅们当中央委员，他们便规定对老帅们的投票只能刚过半数，使之勉强当选，实际上是采用另一种形式进行排斥打击。即使被选进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也不会起什么作用。

九大会场的布置十分奇特，在主席团座位的排列上十分引人注目：在左边就座的是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

兴、温玉成等人；而在右边就座的是周恩来、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毅、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壁垒分明，一目了然！

曾几何时，无情的历史事实终于表明，自称为左派的林彪、江青一伙，不是一个一个都被押上了历史上的审判台，几乎全是右派、反革命，成为遗臭万年的小丑；而被他们咒骂为“老机”、“老右”的，经过大风大浪的考验，都是真正的左派、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马列主义者。

“物极必反”。九大是林彪集团发展的顶峰，也是他反动面目开始大暴露，走向没落破产的开端。

（四）林彪集团走向破产和覆灭

九届二中全会是林彪集团从极盛走向破产的开始。林彪并不满足于九大党章规定他为“接班人”的地位，等到自然接班的到来。用叶群的话来说，就是“怕林彪的身体拖不过毛主席”“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同时还耽心“夜长梦多”，怕接班人地位不稳，中途发生变化。因此，林彪坚持要在宪法草案中规定设国家主席，一心想当国家主席，迫不及待地要抢班夺权。

林彪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前后进行的一系列阴谋活动，搞突然袭击，秘密串连，煽风点火，欺骗同志，结果阴谋败露，遭到破产。1971年中央发出的77号文件《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已有详细的叙述，不再赘述。

九届二中全会这场斗争，最后这样结局，完全出乎林彪集团的预料之外。此后，林彪集团的核心成员黄、吴、叶、李、邱被迫检讨，处于被动地位，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但林彪一伙不甘心失败，便铤而走险，阴谋策划搞反革命武装政变，密谋杀害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其他同志，作垂死挣扎，林彪集团由反党集团一变而为反革命集团，暴露出穷凶极恶的反革命面目。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过程，简单说来就是谋害、南逃、叛逃。这方面的情况，《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三作了详细的揭露，同志们都非常熟悉，这里略加叙述。

一、阴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谋害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

1969年10月，在林彪授意下，吴法宪委任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并委以指挥一切的大权。林立果伙同周宇驰、王飞等人组成“联合舰队”。1970年5月2日晚，林彪接见了周宇驰、王飞、刘沛丰、刘世英等人。5月3日，周宇驰、王飞等开会向林彪表忠心，共推林立果为“头”。这个舰队是林彪谋害毛主席、阴谋武装叛乱的特务行动队。

1970年3月，林立果到上海，在王维国参与下，建立“上海小组”，进行反革命活动。

1970年后，胡萍、王维国、刘锦平、顾同舟（广州空军参谋长），在上海、北

京、广州建立秘密据点。

1970年9月，林彪阴谋窃取国家最高权力未得逞，加紧武装叛乱准备。1971年2月，林彪、叶群、林立果由北京来到苏州，随后林立果经杭州到达上海。3月21日，林立果同“联合舰队”主要成员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在上海制订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阴谋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谋害毛主席，发动武装政变，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

1971年3月31日，林立果在沪召集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秘密开会，确定南京以周建平为“头”，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江腾蛟“负责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

1971年4月，王维国受林立果指挥，在沪成立为政变服务的“教导队”。

1971年3月，广州民航局原政委米家农，在林立果授意下，把原民航局宣传队改造成反革命服务的“战斗小分队”。

1971年9月5日晚，于新野打电话给顾同舟，了解毛主席在南方同各地负责人谈话的内容，并密报林立果、叶群。6日，李作鹏在武汉得到刘丰关于毛主席谈话内容的密告。李作鹏当即返回北京，面告黄永胜、邱会作，黄即电告在北戴河的叶群。林彪、叶群得到黄永胜、顾同舟的密报后，下决心采取行动谋害毛主席。9月8日，林彪亲笔写了反革命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9月10日，林彪又写信给黄永胜：“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交王飞送给黄永胜，让王飞充当林立果和黄永胜之间的联系人。9月8日晚，林立果潜回北京，在空军学院和西郊机场，分别向周宇驰、刘沛丰、江腾蛟、王飞、胡萍等人传达林彪的反革命政变手令，具体策划部署谋害毛主席，发动武装政变。并指派江腾蛟为第一线指挥官，密谋用火焰喷射器、四〇火箭筒打火车，用炸药炸苏州硕放铁路桥，派飞机炸火车，或炸毁专列在上海停车地的油库，由“教导队”以抢救毛主席为名进行杀害，或由王维国乘毛主席接见时动手。

同时，林彪、叶群为作叛逃的准备，指使周宇驰等人从空军司令部拿了三北地区雷达兵部署图，以及可作导航用的我国周围国家电台频率表，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航线图和机场位置、呼号、频率表，广州、福州地区的机场资料。

毛泽东同志于9月12日胜利返回北京，林彪谋害的阴谋彻底破产。

二、阴谋南逃另立中央，实行南北割据，分裂国家。

1971年9月11日晚，王维国打电话向林立果、周宇驰密报，毛主席已离沪返京。林彪、叶群得知这一情况，阴谋带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分裂国家。9月12日，林立果、周宇驰分别向江腾蛟、王飞、于新野、胡萍布置南逃。胡萍安排了南逃广州的飞机，王飞、于新野拟定了南逃人员名单，研究了分工和具体行动计划。并派林彪的256号专机送林立果去山海关转北戴河见林彪、叶群。当晚十时许，周总理发现可疑后，追查飞机去山海关的情况，并命令该机立即返京。胡萍一面谎报去山海关是飞行训练。并谎称飞机发动机有故障，拒不返京；一面要周宇驰向林立果通风报信。周总理又下达一道命令：必须有周、黄、吴、李四人联名指示才能放飞。

三、外逃叛国，自取灭亡。

1971年9月12日深夜，林彪、叶群、林立果接到关于周总理追查飞机的密报后，因反革命叛乱阴谋已经败露，即与刘沛丰等到山海关机场仓惶登机叛逃。他们不等副驾驶员、领航员、通讯报务员上机，飞机滑行灯也没有开，机舱门还未关上，就命令飞机启动滑行，于零点三十二分起飞，外逃叛国，途中机毁人亡。林彪、叶群的武装叛乱阴谋彻底破产。

1971年9月13日三点十五分，周宇驰、于新野、李维信在北京沙河机场乘2685号直升飞机外逃，驾驶员陈修文同志发觉后挫败了他们的叛国行动。直升飞机降落时，陈修文同志被周宇驰杀害。从截获的飞机缴获了大批党和国家的机密文件。

下面回答两个问题：

一、林彪是不是“超级间谍”？十大报告虽曾说过“超级间谍林彪垮台了，更难下手”。（23页）这个问题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提出的起诉书，只列举了他们的四大罪状：煽动、策划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篡党夺权；迫害和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谋害毛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其中并无间谍罪行的条目。如果林彪果真是“超级间谍”，起诉书是不应该遗漏的。

二、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飞机是不是堕毁的？

林彪乘坐的三叉戟256号专机，于1971年9月13日零时32分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1点53分飞越国境，2点30分在蒙古温都尔汉东北六十公里处坠毁。

13日上午八时半，蒙古外交部召见我驻蒙大使许文益，就中国飞机失事坠毁在蒙古境内一事提出口头抗议。大使请示中央后答复他们：是中国民航机迷失航向，误入贵国领土，表示遗憾。

15日我驻蒙大使和蒙方人员一道去察看现场，拍摄了一批现场照片（见材料之三第三部分23证），给中央写了报告。

飞机上的九具尸体，在坠毁现场就地埋葬。这九具尸体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潘景寅，还有司机杨振刚，机修人员机械师邵起良、张延奎、李平三人。

从坠毁到埋葬经过80小时，即暴尸三日有余，这是叛徒林彪的可耻下场！

经过专家鉴定分析，认为这架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野外降落没有成功，造成破碎烧毁，并非空中爆炸或被击落，也看不出发生过格斗的迹象。

（五）严格区分敌我界线和路线是非

耀邦同志多次讲过：要把毛主席和林彪、“四人帮”区别开来，把毛主席的前期和后期区别开来，把毛主席的正确和错误区别开来。这是我们研究“文化大革命”问题时必须遵循的一条原则。

我们在研究“文化大革命”问题时，一定要严格区分两种界限，一是毛泽东同志所

犯的“左”倾路线错误，这是党内同志所犯的错误，要认真分析，吸取教训，引为鉴戒；二是林彪、江青一伙的反革命罪行是敌我问题，他们是篡党窃国大盗，祸国殃民，罪恶滔天，我们一定要彻底清算，充分揭露他们的反革命面目，使他们无法逃脱罪责，受到历史应得的惩罚。

“文化大革命”历史表明，毛泽东同志所犯的“左”倾路线错误，以及他对林彪、江青一伙的信用，对于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出现和横行是有重大的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毕竟同林彪等人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在性质上截然不同。

林彪一伙是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的罪恶目的是要毁灭社会主义制度，毁灭人民民主专政，毁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毁灭我们的党，使我国人民重新沦为受压迫、受剥削、被奴役、被摧残的悲惨境地。他们都有自己的独立的帮派体系。他们不但秘密准备了自己篡党夺权的干部班底，而且秘密准备了自己阴谋叛乱的武装力量——“大小舰队”。他们在全国制造混乱，是为了实现所谓“乱中夺权”。他们的这些阴谋活动是背着毛泽东同志进行的。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他们甚至密谋杀害毛泽东同志和策划进行武装叛乱。因此，林彪一伙的反革命性质是确定无疑的。

与此相反，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严重错误，但是，他在主观上还认为是在拯救和保护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坚持马列主义，是在为中国和世界大多数人谋利益。他在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还是基本上保护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国务院，勉强地保持了党的统一。他保护了中央和地方的一批领导同志，解放了一批干部。例如，他一面遍信林彪、江青一伙的假汇报，受他们的蒙蔽，错误地处理了罗瑞卿、贺龙、“二月逆流”、“杨余傅”等问题，但一经发觉，他能予以平反改正。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同志在一次谈话中说：贺龙、杨余傅、罗瑞卿问题，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搞错了，要翻案。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听了一面之词不好，向同志们作自我批评。林彪自我爆炸后，多次说“二月逆流”不要再提了，亲自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为受诬陷的老同志恢复名誉。对于明显的陷害老同志的假材料，如谢富治报送的诬陷叶剑英同志的假材料立即驳回。

1968年4月13日，谢富治授意“中央清理敌伪档案小组”，将香港《工商导报》1934年6月4日和11月29日，造谣诬蔑叶剑英同志“企图投敌”的文章抄报中央，阴谋中伤叶剑英同志。毛泽东同志阅后严厉斥责：“还是老一套谣言，早已看过，现又送来”（1968年4月23日）。他领导揭露和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对江、张、姚、王等人也进行了多次批判，并且不让他们取得最高领导权。这些都给党后来粉碎“四人帮”造成了有利条件。直到他的晚年，他始终警觉地注意维护中国的安全，一再提醒要警惕北极熊的突然入侵，比较客观地分析国际形势，基本上正确地掌握中国的对外政策，联合一切可以联合力量去反对霸权主义，加强中国和各国人民的友好，努力支援各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因此，尽管他犯了令人惋惜的严重错误，他仍然是受到党内外、国内外一切革命者尊敬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

总之，毛泽东同志所犯的左倾路线错误同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严重罪行在性质上截然不同，必须严格划清界限，决不可混为一谈。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自

以为是为了反修防修，但是这也不能减轻他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悲剧也就在此。这是我们党和人民付出了惨重牺牲所得出的必须牢牢记住的历史经验。